教授治学

修炼学术人格

专访地理科学与城市规划学院许学强教授

无论做学问还是教书育人，最重要的是学术人格的修炼。

——许学强教授

许学强，1939年出生，湖北荆州人，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与区域发展、城市化、城市体系、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和城市与区域规划。先后培养博士四十余名，出版和发表论著150余篇（部），其编著的《城市地理学》（第一作者，与周一星、宁越敏合作）成为高等学校地理学及其他相关专业的经典必选教材。先后任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高校工委书记，广东省高教厅厅长，广东电视大学校长、书记，中山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主任，国际地理联合会（IGU）第三世界发展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城市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等职。



广州市长陈建华（左）向许学强教授颁授聘书



许学强教授的部分论著



2013年11月在“中国城市发展转型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演讲

本报记者 郑舒

从事我国城市地理学研究的人对许学强教授的名字大都耳熟能详，50年来，许学强教授勤勤恳恳，始终坚持探索实干精神和学术人格的修炼，为中山大学城市地理学科的建设和教学，乃至整个中国城市地理学科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如今，已经76岁的许学强教授，回忆起曾经的大学时光和艰辛的治学道路时，仍然充满了怀念和热忱之情，“我一直很喜欢地理学科，这或许是我一生中最值得回忆的事。”

[曾经的逐梦年华]

结缘：偶然中的必然

许学强教授于1939年出生于湖北省公安县一个贫苦农村，当时正值抗日战争爆发，受战争影响，许学强的父亲也一度奔赴战场。“我的父亲在退伍回家以后对我影响最大的事就是教育我要读书，他曾说他之所以能在战争中平安活下来，就在于他认识几个字，部队上因而任命他做了文书。”在父亲的教导下，许学强从小便勤奋好学，在小学5年级时就跳级保送到隔壁县读初中。此后，许学强更是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沙市三中，当时他所在的班60个人中仅有4人有机会读上高中。

上高中以后，许学强始终不忘刻苦学习，回忆起那时的岁月，许学强印象最深刻的却是他的地理老师。“沙市三中老师都来自不同地方，水平都很高，很精干。那时我的地理老师是广东客家人，上课的时候常常介绍各地地理风情，让我对地理充满了好奇和兴趣。当然，我能够结缘中大也是受这个老师影响，他经常诉说中大的红砖绿瓦和绿树成荫的宜人景色。”许教授笑言，“当时高考完我父亲还找人给我算了命，说我正好适合去东南方向发展。虽然我自己曾梦想去北京发展，但在各种机缘巧合下，我最终来到了中大，选择了自己喜欢的经济地理学专业。”

实干：用业绩证明自己

当谈到曾经的大学时光，许教授反复强调“实干”两个字。原来，大学初期的许学强，由于家庭条件的原因，一开始感到了较大的差距。然而，由于心中怀揣着梦想与希望，许学强能够及时调整自我，很快适应了新环境，并努力通过实干提升自己。

“我那个时候学习很刻苦，常常晚上蹲厕所看书。我的一些同学现在对我的印象还是当年那个在厕所半天不出来的人。”同时，许教授还幽默地提到，自己从大三到大五（当时中大是五年制）一直担任系学生会主席。“我在当时不属于根红苗壮的人，能够当上学生会主席都是靠业绩做出来的。我不会唱歌、不会跳舞，但是我可以组织其他人唱歌跳舞，我能通过自己可以做的事为大家服务，所以这个主席我一当就是三年。”正是凭借这种刻苦实干的精神，许学强在大学时代里收获了扎实的专业基础以及良好的组织协调能力。

[一种学术情怀，一种人生态度]

恩师：学术思维的源泉

“如果说我现在有较好的逻辑思维和学术研究能力，这不得不说与我的三位老师的教导有着密切关系。”

提及自己的学术道路，许学强教授首先谈到了自己的恩师。“我上大学时的系主任曹廷藩老师严密的逻辑思维给我印象尤其深刻。他论证问题时有理有据的思维模式对我启发非常大。他时常建议我们看当时《人民日报》的社论，从它的选题、论述到结论去认真研磨，这也很好地培养了我的逻辑辩证思维。”大学毕业时的许学强本打算前往北京地理研究所继续深造，也正是曹廷藩教授劝其留下，安排他从事城市地理方面的研究，从而确立了自己的学术领域。

此外，许教授还深情地回忆起其他两位恩师，一位是时任经济地理学教研室主任的梁溥教授，另一位是教授历史地理学的徐俊鸣教授。“梁溥教授是我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他最大的特点是做事条理简洁、点中要害。我们学生特别喜欢他的黑板板书，只罗列简单事实，却都是关键之处，非常清晰简练的说明问题。而徐俊鸣教授在收集分析整理历史史料上独树一帜。他曾经细微到具体统计了从广州到珠海有多少桥梁、涵洞和轮渡的数量来说明珠江三角洲河涌密布的特征。他让我真正认识到，从事地理科学研究，必须要认真调查、收集、分析、整理资料，这可以说是研究环节中非常关键的一步，是一种基本功。”

三位教授，分别从收集整理资料、分析论证问题和简洁明了说明问题三个方面给予了许学强教授很大帮助，也培养了许学强教授自身的学术思维能力。许教授谦虚地表示，“50多年过去了，我依然觉得自己并没有很好地把三位老师的东西学到家，三位老师在文革中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受到了错误的批判，然而其学术能力和精神却是无法被驳倒的，我至今仍然怀念我的恩师们。”

探索：潜心钻研学科发展方向

1963年7月，许学强从中山大学地理学系毕业，在老师的劝导下选择留校任教。不久，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便席卷全国，在不少老教授相继受到冲击的情况下，许学强在文革中保持低调的姿态。“文革期间，在劳动之余，我一般都是自己看书、学习，可以说，文革后期才是我学术生涯的真正开始。”

“事实上，在文革期间，整个地理系经济地理专业受到的冲击最大，所以在复课之后，我们专业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该如何发展，方向何在。”由于文革的破坏，许学强所在的经济地理专业连续10年都没有招收学生，现在面临重整专业，时任经济地理教研室主任的许学强和其他老师都陷入了困境。然而就在此时，曙光却不期而至。70年代初期，曹廷藩教授带队考察、走访了中国多个城市，并到了北京国家建设部，受到时任建设部规划司王凡处长的接待。王凡同志明确指出，城市规划工作需要一部分经济地理专业的人才，这为处于困惑期的许学强和其他学者指明了一条道路。以往的经济地理主要是为农业和综合考察等服务，而在新时期，要想寻找学科的突破，经济地理也可为城市规划和区域规划等工作服务，中山大学经济地理专业的学者们也因此终于找到了学科的发展方向。

随后，国家建设部也开始了培养城市规划人才的行动，把全国几个知名大学中涉及规划和经济地理的学科负责人聚集在石家庄召开了一次特别的会议，会议明确指出城市规划需要建筑、工程和地理（特别是经济地理）出身的人才。换句话说，这次会议正式把经济地理与城市规划紧密结合起来，许学强他们制定专业的教学计划初步得到认可，为今后学科发展迈开了坚实的一步。

根据石家庄会议精神，1974年，中山大学地理学系面向全国部分省市开办了关于城市规划的一年制进修班，并持续举办了3年。许学强是此次进修班的主要组织者和教学者之一，他对进修班所取得成效感到非常认可，“很多学员在学成之后便利用自己所学为家乡服务，成为城市规划工作的骨干。而进修班的举办对我们老师也是一种锻炼，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为我们接下来的大学经济地理专业招生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1977年，在积累了3年的进修班教学经验之后，中山大学地理学系经济地理专业正式面向全国招收本科生。不同于以往的是，恢复高考之后的经济地理专业，将重心放在了为城市规划服务，面向城市的建设发展需要上。“那个时候我们教研室的老师经常聚在一起，反复认真地探讨专业教学计划，常常讨论到深夜。非常欣慰的是，后来的发展证明，我们当初的选择和革新是非常正确和明智的。”

笃学：中国特色和国际视野相结合

在确定了经济地理学发展方向的同时，许学强教授把自己的研究方向也确定为研究城市地理，将城市发展、城市化、区域城市体系和区域发展等问题作为主要研究的问题。在许教授整个治学道路中，有两个关键词最为重要，即许教授自己所说的，“从中国实际出发”和“国际化的开阔视野”。

80年代初期，许学强在教学实践中，不断积累资料，提高自己学术水平，一方面学习西方有用的城市地理学理论和方法，一方面脚踏实地，调查研究，搜集大量有关中国城市发展的详细资料。在那之前，也正是因为缺少一些数据性的材料和系统的理论与方法指导，导致很多研究不能用事实说话，无法进行科学的数量分析，研究不够严谨深入。因此，许学强专程前往北京搜集资料，拿着中山大学和北京国家建设部开的介绍信，去国家公安部抄写了整整一个星期的资料。一个人忙不过来，还请同学帮忙抄。这些文件都是关于全国各省的人口户籍等资料，在当时属于不对外公开的“保密”资料。许教授特别提到，当时公安部的材料并不完备，缺少福建和浙江两省的资料。许学强因而又特地去了趟福建和浙江，以确保搜集到的资料的完整性。

或许机会真的只留给有准备的人。1981年夏天，香港大学城市区域研究中心主任郭彦宏带队访问中大，并提出可以提供一笔奖学金邀请许学强老师去香港交流访问。许学强便在地理学系相关领导的推荐下，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赴香港合作研究了一年。“在香港的一年里，我比较系统地学习了许多西方的城市地理研究理论，了解了世界城市地理发展的动向，也了解了我们国家城市地理发展的状况。”

在系统学习的同时，许学强始终不忘勤奋笔耕，根据自己的系统研究，独自或与其他同行合作，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发表了20余篇英文文章，成为当时发表英文文章最多的中国内地人文地理学者之一。

回到内地的许学强，在整理了自己掌握的资料之后，与香港中文大学副教授合著了《现代城市地理学》一书，系统介绍了西方城市地理学学科从创设到1982年的整个发展动向，也包括了他自己多年研究成果，为我国的现代城市地理学发展提供了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读物。在此基础上，许学强与北京大学周一星教授、华东师大宁越敏教授合编著了《城市地理学》教材，成为我国城市地理学专业及其相关专业的指定教材，为我国的城市地理学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可以说，手持中国城市发展资料的许学强，努力践行将西方理论与中国城市发展实际相结合的学术理念，写出并发表了一批将现代城市地理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卓有成效的作品。

“中国城市的发展，与西方确实存在某些共同点，但我们更应该看到中国城市发展自身的特殊性，我们可以称之为“中国城市特色”。中国人口众多，区域差异大，东西方文化迥异，加上制度不同，因而在城市化进程中，会出现许许多多与西方不尽相同的地方，所以我们的城市地理学研究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借鉴西方一些有益的理论和方法，这样的研究才能接地气，才可能形成中国特色的城市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才能更好地发挥城市地理学在城市规划中的作用，更好地为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服务。”

[莫讲辛劳，乐为人梯]

育人：问题意识为导向

作为一名学术研究者，许学强在自己的专业领域硕果累累，而作为一名大学老师，他同样有着不凡的成绩。许学强在五十余年的教学生涯中，先后培养了40余名博士生，许门弟子可谓是桃李芬芳，遍地开花。能取得这样的成就不得不说与许学强独特的教学观和教学方法紧密相关。

“开始一段时间里，我在教授本科生课程时，主要以传授知识为主；直到有一次讲公开课时，其他老师认为我的课分析的内容较少，只讲了‘what’，而没有讲‘why’和‘how’，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也对我之后的教学启发很大。”许学强因此开始意识到传统的灌输式教育是不够的，对学生的培养，必须以思维的启发为根本出发点。在此基础上，许学强以“开拓思维”为核心，形成了“启发思维—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教学模式，并应用到硕士和博士的培养中。

“我对博士生的基本要求就是要多读书，主要是读专业代表作（英文书为主）和国内外期刊杂志。这个要求分三步走，一是读；二是在阅读中培养问题感，并撰写读书报告；三是在完成写的工作之后，还要讲，定期召开读书讨论会。”在许教授看来，通过“读—写—讲—讨论”四步走的模式，学生能更加透彻地理解自己的阅读材料，真正将书上读来的知识融会贯通，变成自己的知识。

“我那时有很多行政任务，常常忙得抽不开身，然而却雷打不动地坚持在每个周四晚上参加博士生们的读书讨论会。大家在一起探讨问题，互相切磋。一开始只是我和我的一些博士生，后来发展为不少硕士还有年轻老师都参与进来了。直到现在，不少学生都还很怀念那段时光。”

教学：人格魅力的展现

俗语云“为人师表德为先”，在许学强看来，“教学过程就是教师人格魅力的直接展现过程”。而所谓的教师“人格魅力”，具体说来包含两个层面，一方面表现为老师的学术风范，另一方面体现为老师的行为风范。

在教学实践中，许学强有力地践行了自己“中国特色和国际视野相结合”的学术理念。“我对学生的要求其实很简单，你必须既有国际化视野，又要立足国情。这样你才能明确自己的研究价值，不固步自封，才能有所突破。”许教授指导下的博士生绝大多数都有出国访问或留学的经历，他积极组织各种形式的国际交流，在他看来，这是思维解放的关键举措。

另一方面，许学强也特别强调大学教师应该注重自己的品行，真正做到“为人师表”。“从一个老师是否认真备课、是否迟到早退、是否拖堂，是否从学生的角度思考问题，都能直接体现他的人格和修养”。

对于当下的大学教育，许学强也有自己的见解。对于大学老师来说，普遍存在如何平衡科研和教学工作的问题。然而，许学强认为，科研和教学并不矛盾，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东西。课堂教学能够推动科研的发展，而科研最终又服务于课堂教学。“对于一个大学老师来说，教学始终是基本职责，永远要记得做好自己的本分，切不可顾此失彼。”

[修炼学术人格，最坚实的信念]

回顾自己五十余载的治学道路和教学生涯，许学强教授最大的感受在于，无论是做学问还是教书育人，“最重要的是学术人格的修炼”。

针对学术研究，许教授用了一个十分形象的比喻，“做科研其实和买菜做饭是一个道理，首先你得搞清楚为什么要买菜，是想要做一道什么样的菜，这就是选题；其次你要明白自己该买什么菜，这是收集整理研究对象的资料；最后你还得知道这道菜要怎么炒，这就是运用得当的研究方法。”

然而，以上步骤方法在许教授看来多属于智力层次，而真正的大师的境界除了自身的学术研究的能力以外，还必须注重自己学术人格的修养。“学术研究的能力体现在一个人收集资料、分析问题、判断表达能力等方面，然而，学术和人格是分不开的。学术人格的修养强调的是学者的人格魅力，一个人是否具有勤奋、谦虚、坚持或合作、包容等精神。从某种程度上，学术人格比智力因素更为关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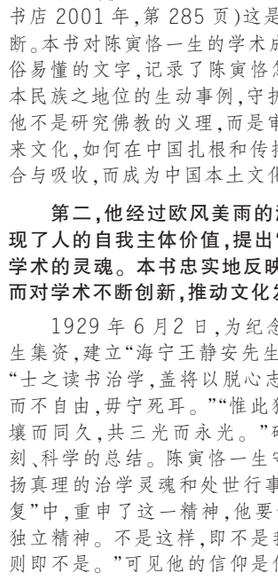
学术人格修养的信念也一直贯穿于许学强五十载的教学实践。无论是对学生知识上的启迪，还是德行方面的教育，许学强都始终兢兢业业，用自己的踏实肯干的精神、严谨的学术作风和亲切和蔼的态度真正做到了表率作用，用爱用心感染了每一个学生。

可以说，从年少时的实干精神，到艰辛探索的学术追求和甘为人梯的奉献，许学强教授始终在坚信中践行着“修炼学术人格”的信念。作为我国城市地理学科的带头人之一，许学强以其过硬的专业技能和严谨治学、勤奋探索的学术风范，赢得了国内外学术界的一致认可。而其培养了40余名博士和大量硕士和本科生，为我国城市规划的人才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地理或许已经成为许学强教授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其学术人格修养的寄语更应为中大学子谨记遵循。

学术空间

一部客观真实的陈寅恪传记

张荣芳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11月，出版了吴定宇教授的新著《守望：陈寅恪往事》。该书除自序、结语之外，分五章，总50多万字。陈寅恪是20世纪中国学人的杰出代表，为中国学术文化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读懂了陈寅恪就读懂了二十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史。但是，要读懂陈寅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本书叙述了陈寅恪曲折坎坷人生，展现他不同寻常的求学经历、治学生涯、治学方法、终身守望“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人风骨和难以超越的学术成就。作者运用大量的有关陈氏的档案文献、私人日记、书信、回忆、口述史料等第一手资料，在历史细节中，还原出一个真实的陈寅恪，为你读懂陈寅恪提供了入门津梁。其真实性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第一，真实地记录了陈寅恪守望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光辉人生。

陈寅恪出生于19世纪末，他的学术事业开始并完成于20世纪。这个时期是中西文化大碰撞、大融合时期。他出身于书香世家，幼承家学，从小生活在陈氏家族文化圈中，苦读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对传统文化有深厚的感情。他的祖父宝箴、父亲三立对外来文化又持开明态度，有助于他形成开放的文化心态。他走出国门，在外留学十四五年，形成了百科全书式的知识结构。但终其一生，他始终坚持“中国文化本位论”的基本立场。他总结中国思想史的发展，认为“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二千年吾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第285页）这是陈寅恪关于“中国文化本位论”的著名诊断。本书对陈寅恪一生的学术成就，都是居于这种认识而加以探索，用通俗易懂的文字，记录了陈寅恪怎样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又不忘本民族之地位的生动事例，守护着中华传统文化。例如他对佛经的研究，他不是研究佛教的义理，而是审视这种与中国传统儒学文化相冲突的外来文化，如何在中国扎根和传播，如何被中国本土文化所选择、消化、融合与吸收，而成为中国本土文化的一部分。

第二，他经过欧风美雨的洗浴，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精华，发现了人的自我主体价值，提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主张，这是学术的灵魂。本书忠实地反映了陈寅恪一生坚守并践行这一理念，因而对学术不断创新，推动文化发展。

1929年6月2日，为纪念王国维逝世二周年，清华国学研究院师生集资，建立“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约请陈寅恪撰写碑铭。其词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碑铭对王国维留下的精神财富作了最深刻、科学的总结。陈寅恪一生守望着摆脱俗谛，精神独立，思想自由，发扬真理的治学灵魂和处世行事准则。1953年底，他在“对科学院的答复”中，重申了这一精神，他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可见他的信仰是何等坚定。晚年他研究《再生缘》，主要是因为作者陈端生不为“三纲五常”传统束缚的自由思想引起他的共鸣，在《论再生缘》一文中说：《再生缘》之文“为宋四六体中之冠”，“此等之文，必思想自由灵活之人始得为之。”“由于端生之自由活泼思想，能运用其对偶韵律之词语，有以致之也。故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举此一例，可概其余。”对绝世才华的女性陈端生给予很高的评价，“端生此等自由及自尊即独立之思想，在当日及其后百余年间，俱足惊世骇俗，”“陈端生亦当日无数女性中思想最超越之人也。”由此陈寅恪论到“就吾国数千年文学史言之，骈俪之文以六朝及赵宋一代为最佳。”其原因是由于“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故文章亦臻上乘。”（以上引文见《寒柳堂集》第73,72,66,63页）。晚年写《柳如是别传》，在第一章《缘起》中，明确谈到写此书的目的，是为“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的柳如是辩诬。（《柳如是别传》上，第4页）。陈寅恪笔下的柳如是，虽然出身妓女，但深明大义，其才华、性格和儒气侠风，均为当时一般读书人所望尘莫及。陈氏通过大量的追综考证，揭示出柳如是坚持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民族气节、道德情操以及反清复明的本来面目。

第三，学术是陈寅恪的生命，进入他的学术领域，反复钻研其著作，把生活与学术揉合起来写，真实地反映传主的学术品格和人格魅力。

陈寅恪的学术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作者分“初探硕果”、“再探硕果”、“三探硕果”三节，分析探讨其学术成果。

陈寅恪1926年7月至清华国学研究院报到，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被迫离开北平，正好11年。在国学研究院他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被称为“四大导师”。这个时期，他生活最安定，基本上不受外界干扰，专心治学，读书最多，思维最活跃，著述最勤，发表论文50多篇（包括各种序、跋）。其学术见解得到学术界的认同，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胡适评价说：“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见识、最能用材料的人。”（《胡适日记》，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40页）。这个时期，他完成了学术研究的第一次转型，即由对佛经版本、文字、源流的考订，转到把重点放在中华民族历史研究上，尤其注重魏晋历史的研究。为他的学术研究增加了新的兴奋点和增长点。同时为了中国学术的独立，提出了学术研究应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主张。

1937年11月，陈寅恪举家逃避日寇离开北平，到1949年1月进入岭南大学，正好12年，完成了他学术研究的第二次转型。这个时期，正是国家多难、家庭多事、他本人多病的年代。他颠沛流离，在贫病交迫的艰苦环境中，克服图书资料匮乏、视力衰退乃至双目失明的重重困难，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元白诗笺证稿》三部不朽的传世之作和30多篇论文及许多感人肺腑的诗歌。这是他在国难当头之时，用生命之水，浇灌出的学术之花。史学与文学是两个不同的学科，陈寅恪以诗证史、以史释诗、诗史互证，在上述三部著作中，互相参照、互相释证，在隋唐史研究中，提出许多新鲜、深刻、独到且自成体系的见解，超越前人，极富启发性，对中外学人确实起到指导作用。《剑桥隋唐史》的主编崔瑞德在该书的导言中，称陈氏为“伟大的中国史学家”。“他提出的关于唐代政治和制度的一个观点，远比以往发表的任何观点扎实、严谨和令人信服。”（《剑桥中国隋唐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1页）。可见陈氏的研究成果，是世界的文化瑰宝。

1949年1月进入广州，至1969年10月逝世，在岭南大学、中山大学生活了20年。除了继续在魏晋隋唐史领域发表论著之外，拓展了新学术领域，明清史成为他新的学术增长点，写出了《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等传世之作，实现了第三次学术研究内容、研究重点的转移。

作者吴定宇是一位中文系的教授，他深入陈寅恪的史学研究领域，并且结合陈寅恪的生活经历和内心世界，分析其作品，展现其学术品格和人格魅力，叙述是成功的。他1996年分别在大陆和台湾出版过《学人魂——陈寅恪传》。本书，是前一书的扩大和深化。周一良先生在病中，对前一书有过较高的评价，说“此书将生活与学术糅合起来写，颇为成功，对了解陈先生很有用。”（本书第500页）。以此来评价《守望》也是适用的。（未完待续）